

史料、识见与精神魅力

——《中外文学交流史》与《中国-日本卷》读后卮言

王向远

钱林森、周宁教授主持的《中外文学交流史》（全17卷）作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2015年已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是迄今为止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的集大成，也是新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可喜可贺。在漫长的编辑出版过程中，钱林森先生也多次与我谈起。书出版后，钱先生希望我写篇书评文章，我却因身体及写作计划安排上的原因，无奈一拖再拖，迟迟未能动笔。现在已经进入2017年，不能再拖了，于是中断手头的活儿，坐下来翻阅这套大作，并通读了王晓平先生执笔的《中国-日本卷》。

这套丛书的总书名是《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外文学交流史”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比较文学的兴起而兴起的一种新的、相对独立的研究模式。此前，中外文学交流史一般被含在“中外交流史”或“中外交通史”的范畴，属于历史学的研究，文学交流作为整个历史文化交流的一部分，往往被简单化地加以处理，专门著作很少，而且单薄。现在它是从历史学独立了出来，成为一种“文学研究”，对文学学科，特别是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具有重要价值。依我的理解，“中外文学交流史”研究的是“交流”，而“交流”是一种行为，历史上的行为是否发生，是需要有文献佐证的，因此中外文学交流史的研究属于传统的建立在文献学基础上的实证研究，在这一点上它不同于“中外文学关系史”。“关系史”比“交流史”范围更广。“关系史”应该含有平行贯通的比较，研究事实之外的形似神通，虽然没有“交流”的史实，但为着凸显各自特性、为着说明某一理论问题，需要进行平

行的比较，因而“关系史”包含着“交流史”，但交流史似乎可以不写这一层“关系”。

“交流史”作为文献学的实证研究，关键在史料。在今天网络信息化的时代，许多史料已经数字化，查阅、利用起来，较以前方便多了。方便当然是好事，使得许多以前不好找的史料好找了，以前稀见的史料不稀见了，研究者收集史料的难度大大减小了，工作量减轻了。但是另一方面，这也使得文献实证研究的劳动含量减小，史料的稀见性减弱、垄断性难以存在，因而价值反而降低。在这种情况下，今后这类研究若仅仅局限于文献学的范畴，仅仅是整理、叙述史料，就显得不合时宜了。不妨借用人们常说的一句话：资料的数字化对今天的文献学的实证研究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所谓“机遇”，是说以前凭一人之力难以搜集那么多史料，现在有可能了；所谓“挑战”，是说以前的那种“奇货可居”的史料变少了，一部学术著作假如主要是展示史料，特别是并不稀见的史料，那就远远不够，还需要作者发掘尚未进入公共检索领域的稀见史料，并给予思想的观照，对史料要有分析、有活用，有理论见解。换言之，在如今数字化的时代，材料好找了，书容易写了，但同时书不容易写好了。

近年来，为了应对上述的挑战，一些学者在研究的方式方向上做出了调整。那就是瞄准那些没有数字化、也难以数字化的稀见史料作为研究对象。而在中日两国文学、文化研究领域，由于历史交流悠久，史料积淀极为丰厚，有待发掘和利用的史料仍有不少。在这方面，日本学研究专家王勇教授就做出了可贵的探索，他以晚清时期中日两国交涉过程中留下的大量的“笔谈”作为收集与研究的对象，亲自到相关机构场所去寻找查阅，这样的史料收集需要巨大的劳动量，也需要历史学、考古学的见识，因而具有很大价值。而王晓平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日本汉文古写本整理与研究”，所要整理研究的是日本古代汉文的“写本”，这类资料往往独一无二，非专门家则

难得一见，可谓罕见也，收集资料的难度可想而知。

史料需要长期积累，尤其是第一手的、罕见的史料，有些是可遇不可求的，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齐备。据我所知，在中日文学交流史方面，占有史料最多的当数王晓平先生，学界同仁大概无出其右者。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现在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他的丰厚的著述，无不建立在丰富扎实的史料的基础上。晓平先生在日本执教十几年，有机会在遍寻日本各地图书馆、书店。还记得十多年前我在日本时，每逢京都的秋季、春季古书（旧书）书市，就和晓平先生相约赶集访书。晓平先生从大阪赶来京都，我们一起去书市，以“淘宝”的心情去淘书。那时候也深深感受到了晓平先生对书的热爱。在书市上，他总是在一般人不太驻足的冷僻旧书前，一本本捧起来、摩挲许久。天色向晚时，我们找附近一家居酒屋，进去盘腿而坐，吃饭喝啤酒聊天，谈的也大多是做人做学问的事，还有当天淘来的书。

1987年王晓平先生出版的《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一书，是晓平先生在这个领域中的处女作，也是中国学界在这个领域的奠基之作。我记得我曾在一篇文章说过这样的话：这么多年来，中国读者（包括我在内）关于中日近代文学交流史的知识，主要是来自晓平先生的这本书。这本书出版之前，中国没有相关的书，而日本研究中日古代文学交流的成规模的大作固然已经有了若干（如小岛宪之的《上代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但中日近代文学交流史方面系统翔实的著作还极罕见，因而说那本书“填补空白”，并不为过。从1987年以后到《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日本卷》问世的三十年间，晓平先生相继推出了《佛典·志怪·物语》、《梅红樱粉——日本作家与中国文化》、《远传的衣钵：日本传衍的佛教敦煌文学》、《唐土的种粒：日本传衍的佛教故事》、《日本诗经学史》等，特别是前几年出版的被列为国家社科基金文库的一百万字的巨著《中日文学经典的传播与翻译》（上下），真令人叹为观止。这些著作，分别从中国作家与日本文学、日本作家与中国文学、日本汉学史、佛教文学、翻译及翻译文学等诸种

角度切入，每本书都写得精彩纷呈，各书之间都有内在衔接与关联，但又不相互重复或重合度很小，而且总体看来，都属于“中日文学交流史”的范畴。这些都使得他在这个领域中，三十年来一直保持着遥遥领先的位置。在学人辈出、后学强劲的中国学界，这非常的不容易。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日本卷》就有了扎实的基础。这本书版面字数多达84万，在整套17本书中是篇幅最大的。这一方面直观地表明了中日文学交流史史料矿藏的丰富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作者旺盛不衰的创造力。

作为篇幅巨大、集大成的交流史，《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日本卷》免不了要吸收、改编之前作者的相关成果，因而免不了与前作有一些重合之处，但完全是在学术规范之内。而且前作说得多的，在这里就少说略说；前作说的少或没有说的，就展开说，都服从于整部书的独立架构。全书从汉字的传播说起，既涉及两国文人诗人之间的交流，如遣唐使群体与汉文学的关系、明清旅日儒商与日本文人的诗文之交，也涉及日本文学中的中国文学文化的传播与影响，如平安王朝时期日本的汉文学创作及与唐代文学的关系，平安王朝时期宫廷的游乐习俗及与中国文学文化的关系、日本中世时代禅林文学、军记物语、能乐中的中国形象、江户时期日本读本小说与中国明清小说，中国的蒙学书对江户町人启蒙教育的影响，江户文学的庶民性与明清文学的关联、明治时期日本知识人的汉文及汉文学修养等，还涉及诗学、歌学与文学理论之间的交流，如日本的歌学的形成与汉唐诗学的影响等。全书十二章将时代推移与论题转换有机结合在一起，避免了编年史式的呆板结构。

我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通读晓平先生的这部新作，每每感叹史料的丰富。看得出，这些史料，有许多是电脑上找不来的，是第一手的。作者掌握了大量史料，但并非在书中铺排史料，而是将自己史家的识见随时贯穿其间，这是晓平先生著述中的一贯风格。众所周知，学术界曾长期存在着“实证派”与“理论派”的分歧与争论，“实证派”

讽刺“理论派”的宏大叙事与体系建构，而“理论派”则瞧不上“实证派”的只抖书袋子，没有个人见识更遑论思想生产。这实际上是学术研究中“知识生产”与“思想生产”的不同价值取向之间的分歧，其实平心而论，两者同样重要，而且相辅相成。没有实证研究的基础，不接地气，思想如何在空中楼阁中诞生？而没有思想，资料就难以活用，就缺乏灵动。我觉得晓平先生既是史料派，也是理论派；或者准确地说，在他那里不分派，两者水乳交融。他的著作从来不标举西方的什么新潮、什么主义，当然也绝不会拿中国的、东方的材料来证明西方某种理论、某种主义的普适性。然而却不乏识见与思想。这些识见与思想，是从史料阅读、分析中自然产生的，是朴素无华的，但却闪着思想的微光。

例如，在《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日本卷》中，说到汉字，有日本自造的所谓“国字”，中国人许多都不认得，于是说：“大体说来，我们对域外的汉字还比较陌生，还没有一部像《大汉和词典》一样包括中日汉字的大词典，更不用说将朝鲜半岛等其他汉字文化圈的汉字都收纳进来的《亚洲汉学大词典》以供研究，笔者认为，这件事早晚会有人做的。”（第11页）这就是思想。真正的思想是指导人们如何思维、如何行动的。晓平先生的这段话启示人们：汉字不仅仅是国学的载体，也是东亚研究乃至东方学的载体，汉字研究也要突破传统的国学范畴，或许搞文字研究及词典编纂的专家，会从这种论述中得到启发并付诸行动。

再如，在谈到日本人对汉译佛经的训读及抄写，具有家族世袭的传统这一现象时，晓平先生认为：“世袭不利于广泛传播，却又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学风的严肃性和严谨性。那些古典写本能够流传至今，与这样的学风与传承体系，不能说没有关系。”此言极是！用这样话来评价日本历史上一直具有的某种学艺代代家传而不外传的所谓“家元”制度，也十分得当。对“家元”的正面负面的价值，日本学者也做了许多研究讨论争论，但似乎都不及晓平先生这几句话简明扼要而

又中肯。其实中国本来也有“诗书传家”的传统，但无奈周期性的改朝换代，每每使贵族沦为“贱族”，衣食性命难保，诗书就难为继了，所以有些中华文化典籍，还是日本人给保存得更好。

又如，关于日本历史上阅读理解中国典籍的特有方式——训读，晓平先生以“翻译”来定义训读，他写道：“简单来说，训读就是一种依附于原文的翻译。和今天常见的抛开原文炉灶的翻译不同，是在特殊环境下产生的充分利用原有文字效果、通过两种文字的共同作用来实现交流目的的翻译形式。”（第20页）这是一种新见解，是用广义的“翻译”来定义“训读”，在译学理论上也是饶有趣味的。依照这种解释，我一下子感到我最近在《“译文学”——翻译研究新范型》一书及《“翻”、“译”的思想——中国古代翻译概念的建构》一文中提出的“翻”与“译”的辨析论，又在晓平先生的论述中找到了新的例证。日本人对汉文的“训读”不是另起炉灶、脱胎换骨、翻转、翻飞的“翻”，而仅仅是一种从一端到另一端的平面移动的传达即“逐译”或“译”。由于“翻译度”的不同，“翻”有多种方式，“译”也有多种方式。只有研究文学交流史，才能更多地发现这一点。

《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日本卷》涉及的时段是古代至近代一千多年间的中日文学交流史，这段文学作为传统文学史，主要是中国文学在日本传播与影响的历史。而20世纪的现代文学则主要是日本文学影响中国文学的历史，在文学交流的流向上完全不同。由于晓平先生专攻传统文学，在《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日本卷》中，20世纪中日现代文学交流部分未予涉及，但是即便如此，本书在内容上已经相对完整了，篇幅上已经超规模了。以一人之力，写成千余年间中日两国文学交流的通史，而且写成如此大的规模，一个学者的气魄、能力与坚韧，尽在其中了。按目前流行的做法，80万字的篇幅，可以组成一个写作班子来分工写作了，但是晓平还是自己来完成。他手下不是无人，他指导着多名博士和博士后，但他仍然自己来做。中外学术史的史实早已证明，真正的思想只能是个人独立思考所得，而不是集

体的公约数，大凡有质量的学术专著都是个人的创作。除去资料性的汇编校注类书籍，就学术专著而言，多人合作的作品，要保证学术质量是很困难的，那只是迫不得已的选择。晓平先生的每本书，包括长达八十万、一百万的大作都是独著。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值得我们见贤思齐了。

《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日本卷》是一部真正的大作，是晓平先生又一次成功的自我挑战。真正的学术研究本来就是一种挑战性的工作，学者需要不断地试探自己的“可能”的限度，不断地挑战极限，这样他的生命力、创造力才能得到充分释放与发挥，这也是著作者的乐趣之所在。晓平先生以他的著述，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如果考虑到晓平先生的视力只能看清三号大的字体，再想象一下这些厚重的成果需要有多大的文献阅读量，我们这些视力还算可以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会作何感想呢？《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日本卷》所显示的这种含蕴、博大、深厚、持重、沉潜，所折射的正是一个学者的乐此不疲、自得其乐、孜孜探求的学历、活力、定力、功力、毅力和创造力，概言之就是一个学者的精神魅力。当这种精神魅力灌注到书中的时候，书就有了鲜活的生命，就有了感染力。对读者而言，这是最为可贵的。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